

农地转出对农村妇女获得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 CFPS 2020 的实证分析

温顺生^{1,2}, 郑源¹

1. 广西民族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6;

2. 广西民族大学 边疆民族地区公共安全治理研究中心, 广西 南宁 530006

摘要:农地流转日益成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关注农地转出对农村妇女获得感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CFPS 2020),实证分析农地转出对农村妇女获得感的影响,发现:(1)农地转出显著提升了农村妇女的获得感水平;(2)农地转出对农村妇女获得感的影响存在非均衡性,农地转出显著增进了农村妇女的经济获得感、民生获得感和发展获得感,而对政治获得感的改善乏力;(3)劳动力转移在农地转出与农村妇女获得感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4)异质性分析表明,农地转出对无农业机械、不享有代际支持农村妇女的获得感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完善农地流转市场、社会保障体系和降低劳动力转移风险等政策建议,以期提升农村妇女的获得感。

关键词:农地转出;获得感;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D601;C9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5.05.011

文章编号:2096-9864(2025)05-0085-10

培育农地流转市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农业经营方式创新,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1]。农地转出作为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形式,不仅重构了农户的生计方式,更深刻地嵌入了其社会关系网络与心理认知结构。现阶段,学界对农地转出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收入效应或福利效应两个方面,但在作用方向上尚存较大分歧。在收入效应层面,农地转出虽可以通过增加租金和非农就业提升农户总体收入^[2],但当农户的非农收入占比过高时,其增收效应则会被显著削弱^[3-4];在福利效应方面,由于测量框

架与评价维度的差异,研究结论亦不一致,既有研究表明农地转出有助于提升农户福利水平^[5],也有研究发现其可能降低社会保障水平,对福利产生负面影响^[6]。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通常以男性户主为代表,将农户视为同质化的分析单元,忽视了家庭内部性别维度的差异。这种“性别盲视”难以揭示农村妇女在农地转出过程中的真实处境,亟须引入性别视角,通过性别分层深入探讨其差异化影响,从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切入点和实践意义。

对于获得感的概念的探讨,现有研究主要依托“相对剥夺感”理论框架进行反向构建^[7],

收稿日期:2024-11-29

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2FGL028);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gxmzu-chxs2024138)

作者简介:温顺生(1977—),男,广西壮族自治区上林县人,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乡村治理和民族地区公共管理;郑源(2001—),男,河南省南阳市人,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乡村治理。

强调获得感具有客观获得与主观满足的双重属性,兼具公平性、包容性与未来预期投射的特征^[8-10]。在测量方法上,学界逐渐形成横向社会比较和纵向时序比较两种测量范式,其中横向社会比较维度是个人利益获得与他人利益获得之间的比较^[11],纵向时序比较则是人们对实际获得前后阶段变化的评价^[12],而文宏等的“三维整合模型”突破了单维测量的局限^[13],既考虑了现实获得,也兼顾了纵向时序对比,对获得感的测量更加系统、科学和全面。

综上,尽管学界对农地转出的影响与获得感有了一定的研究,但以往的研究往往从农户整体的视角来探讨农地转出的影响,忽视了家庭内部不同成员在机会和能力上的差异,而这种性别角色的差异可能会导致获得感的不同。鉴于此,本文拟聚焦农村妇女这一研究主体,以 2020 年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数据(CFPS 2020)为样本,对农村妇女的获得感定义进行多维度嵌入,构建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民生获得感和发展获得感四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检验农地转出对农村妇女获得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一步揭示农地流转对农户影响的复杂机制,以拓展和深化相关研究边界和内容。

一、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设

1. 农地转出与农村妇女获得感

“获得感”与“相对剥夺感”是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相对剥夺感”是由于处于不利地位而产生的负面情绪体验,而“获得感”是由客观的获得而产生的积极情绪体验。借鉴文宏等^[13]的研究,本文把获得感分为经济获得感、民生获得感、政治获得感和发展获得感四个维度,探究农地转出对农村妇女获得感的影响。

(1) 农地转出与农村妇女经济获得感

收入增长是获得感的直接来源,农地转出

优化了农村妇女的收入结构,有效促进了农村妇女的经济获得感。农地转出使得转出户能够获得稳定的地租收入,同时释放出的劳动力可以转向非农产业,从而可增加工资性收入,优化收入结构。对于农村妇女而言,收入的增加对其经济获得感的提升存在家庭外部和内部两种路径。其一,从家庭外部视角来看,农地转出提升了农村妇女的家庭绝对收入和经济地位,农村妇女能够更好地满足自身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获得更多的外部认可与尊重。其二,从家庭的内部视角来看,一方面,农村妇女进城务工可以增强其经济独立性和决策自主性,有助于减少性别歧视,缓解性别地位的不平等现象;另一方面,受家庭生命周期、代际功能变迁和发展目标等多重因素影响,农地转出促进了家庭资源在城乡间的有效配置,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14]。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H1 农地转出可以增进农村妇女的经济获得感。

(2) 农地转出与农村妇女民生获得感

民生获得感是居民对其生活质量的主观感受,关系到居民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农地转出提升农村妇女民生获得感的途径有两种。其一,改善农村妇女享受的公共服务条件。农地转出后,农村妇女有更多机会参与到非农工作中,使得她们能够享受到城市的医疗、就业、住房等公共服务。其二,提升农村妇女的社会保障水平。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村妇女有机会参与到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中,这意味着更稳定的未来预期,有利于增强农村妇女的安全感和获得感。实证研究表明,农地转出后,农户在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居住条件和就业发展等方面的隶属度均有所提升,尽管心理与健康隶属度略有下降,但总体福利指数仍呈现上升趋势^[15]。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H2 农地转出可以增进农村妇女的

民生获得感。

(3) 农地转出与农村妇女发展获得感

发展获得感既反映了个体对过往努力成果的满意程度,也包含着对未来发展的信心和预期。具体来讲,农地转出提升农村妇女发展获得感的途径有三种。其一,农地转出提升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农地转出后,农村妇女有更多进入城市工作的机会,且可增加家庭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其二,农地转出增强农村妇女未来发展的信心。在出租土地的过程中,农户一般都会签订正式的合同,这种法律上的保障可以解除对于土地的后顾之忧,农村妇女能够在城市寻求长期发展,有利于人力资本的有效积累,拓宽职业发展前景,增强未来发展信心。其三,农地转出增加农村妇女的生活满意度。在农地转出的过程中,农村妇女可体验到被尊重感和“成人之美”的道德感,这些高阶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可进一步激发农村妇女的自我价值获得感和道德获得感^[16],增加生活满意度。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H3 农地转出可以增进农村妇女的发展获得感。

(4) 农地转出与农村妇女政治获得感

政治获得感是居民对政治氛围、政策认同和政治参与的感知和评价,农地转出后,一部分农村妇女会选择留守,这部分“无地可种”的妇女政治获得感不会有任何改善,甚至还可能会有所降低;另一部分妇女会选择进城务工,面临城市和农村两种不同的结构和文化环境,她们不仅缺乏政治参与的热情,更缺乏政治参与的途径。此外,由于文化和教育水平的限制,她们难以理解复杂的政治体制和政策制定的过程,会出现政策认同感较低和政治信任不足的问题,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农地转出后的妇女政治获得感不足。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H4 农地转出对农村妇女的政治获得感影响不显著。

综上所述,农地转出通过增强农村妇女的经济、民生、发展和政治四个维度的获得感,共同提升农村妇女的获得感水平。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H5 农地转出可以显著增进农村妇女的获得感。

2. 农地转出对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妇女获得感的影响

(1) 农地转出与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

根据推拉理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们之所以迁移和流动,是因为人们可以通过流动就业改善生活条件^[17]。于是,流入地的那些使移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的那些不利的经济社会条件就成为推力,人口迁移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促使农户转移到城市的推力包括农业部门与非农部门的价格差异过大、农村劳动力过剩、非农产业发展不足等。一般而言,农地转出后,男性劳动力会优先转移,而女性劳动力则可能会选择留守。因此,探讨吸引农村妇女转移到城市的拉力,必须考虑到性别角色的差异,不能笼统地对农户整体进行分析。农地转出后,农村妇女转移到城市的拉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经济因素驱动。尽管地租和男性的工资可以为家庭带来一定的收入,但对于需要赡养老人和抚养儿童的家庭而言,这些收入可能仍然有限。为了寻求稳定的收入来源,提高家庭经济水平,降低经济风险,农村妇女也可能会选择进城务工。其二,家庭决策与性别角色变化。随着性别平等观念在农村的普及,女性的家庭地位逐渐提高,农村妇女有了更高的决策自主权,她们也希望参与到城市的非农工作中,以实现自身的发展和提高家庭收入。其三,子女教育需求。农村妇女选择

进城务工,也是出于为子女提供更好教育机会的考虑,家庭中的男性可能会选择收入更高的工作,没有时间照顾子女,而妇女则可以选择较轻松的工作,以便照顾子女的教育。其四,社会文化因素。相对农村而言,城市的现代化和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农村妇女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特别是年轻的农村女性,她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来拓宽视野,丰富自己的生活。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农地转出对城乡间劳动力转移具有正向促进作用^[18]。

(2) 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妇女获得感

劳动力转移主要通过以下机制影响农村妇女获得感。首先,农村妇女从传统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进入非农工作领域,获得了工资性收入,改善了家庭的收入结构,提高了妇女的经济独立性和自主性。随着妇女工资性收入的增加、资源在城乡间的有效配置,城乡收入差距显著缩小^[14],有利于提升农村妇女的经济获得感。其次,进城务工的农村妇女可以享受到城市中更为完善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这显著增强了她们的民生获得感。再次,农村妇女在城市中可以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拓宽个人的发展前景,其发展获得感也随之提高。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H6 农地转出可以通过促进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进而增进其获得感。

二、研究设计与描述性分析

1. 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20 年 CFPS 作为分析样本,该数据库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构建,旨在通过跟踪搜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面的数据,反映我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CFPS 调查范围广泛,可以视为全国性的样本。本文根据 CFPS 中的家庭

经济数据库和个人信息库相关变量合并为截面数据,剔除不符合要求和数据存在明显错误的样本,最终获得样本共计 9085 个。

(2) 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的因变量是获得感。参照文宏等^[13]的研究将获得感设定为四个维度,根据实际情况对三级指标进行修正和完善,共采用 4 个二级指标、15 个三级指标来构建获得感的评价指标体系。

①经济获得感。经济获得感包含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根据实际情况,笔者选择“家庭年度总收入”来测量客观物质获得,选择“收入在本地的位次”来测量横向经济获得感,选择“住房面积是否变化”来衡量纵向经济获得感。经济获得感的这三项分指标,既有对居民实际获得感的测量,又包含了居民物质需求满意度的主观评价。

②政治获得感。政治获得感是民众感知政治氛围、政民关系、政治信任、政治认同和政治参与热情的主观感受,获得感必须包含公平公正的特征,保障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本文选取“贫富差距问题的严重性评价”来测量公平获得感,选取“利用电视/网络了解政治信息”和“通过网络发表政治言论的频率”测量政治参与情况。

③民生获得感。民生获得感是民众的基本生存与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的状况得以实现与保障从而形成的主观感知。本文选取“社保参与项目数”和“社保问题的严重程度”来测量居民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获得感,选取“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和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来衡量居民在公共服务方面的获得感。

④发展获得感。发展获得感来自纵向时序比较,这种比较涉及过去、现在和未来,既有以往努力所获得成果的满意度,也包含着未来发

展信心所带来的安全感、幸福感。本文选取“本地社会地位”“生活满意度”和“未来的信心程度”来测量居民的发展获得感。

(3)变量界定与测量

①被解释变量。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获得感,由经济获得感、政治获得感、民生获得感和发展获得感构成,通过熵值法求出这四个维度获得感得分,各维度获得感的权重分别为31%、23%、33%和13%。

②解释变量。本研究的解释变量为农地转出行为,发生农地转出行为的赋值“1”,没有发生的赋值“0”。

③中介变量。本文的中介变量是劳动力转移,非农就业赋值“1”,从事农业赋值“0”。

④控制变量。农村妇女的获得感除受农地流转这一变量的影响外,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

响。根据以往的研究,本文选择年龄、受教育程度、农业机械、家庭生活条件、农业人口占比、外出务工人员、家庭商业保险、子女数量、代际支持和地区作为控制变量。变量定义与说明见表1。

2. 描述性分析

由表1可知,从获得感来看,未转出组均值为2.98,转出组均值为3.10,这表明转出组妇女获得感均值要高于未转出组,T检验也表明二者存在差异 $[t = -2.6267, Pr(T < t) = 0.004]$ 。进一步分析发现,农地转出对构成妇女总体获得感的二级指标的影响存在非均衡性,相较于未转出组,转出组妇女的经济获得感、民生获得感和发展获得感均高于未转出租,T检验也表明二者存在差异,而政治获得感的差异并不明显,未能通过T检验,这种非均衡性有必要进一步进行计量检验分析。

表1 变量定义与说明

变量	变量赋值与说明		未转出组		转出组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获得感	连续变量	2.98	1.86	3.10	1.73
	经济获得感	连续变量	0.43	0.41	0.45	0.42
	政治获得感	连续变量	0.60	0.50	0.60	0.48
	民生获得感	连续变量	1.37	1.08	1.43	1.03
	发展获得感	连续变量	0.58	0.48	0.61	0.44
解释变量	农地转出	租出土地赋值“1”,没有赋值“0”	—	—	—	—
中介变量	劳动力转移	非农就业赋值“1”,从事农业赋值“0”	0.71	0.45	0.76	0.43
控制变量	年龄	0~12岁赋值“1”,18~35岁赋值“2”,36~59岁赋值“3”,60岁及以上赋值“4”	3.85	1.05	3.95	1.05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赋值“1”,初中赋值“2”,高中赋值“3”,大学及以上赋值“4”	0.61	0.87	0.59	0.84
	农业机械	有赋值“1”,无赋值“0”	0.44	0.50	0.29	0.45
	家庭生活条件	用水质量高赋值“1”,低赋值“0” 燃料质量高赋值“1”,低赋值“0”	1.05	0.67	1.27	0.68
	农业人口占比	农业劳动力占家庭劳动力的百分比	0.41	0.30	0.24	0.30
	外出务工人员	外出务工数量1~7	0.53	0.87	0.64	1.03
	家庭商业保险	有赋值“1”,无赋值“0”	0.31	0.46	0.37	0.48
	子女数量	子女数量1~9	1.01	1.01	0.94	0.94
	代际支持	有子女经济支持赋值“1”,无赋值“0”	0.17	0.37	0.24	0.42
	地区	东部赋值“1”,中部赋值“2”,西部赋值“3”	2.17	0.79	2.0	0.73

注:为便于计算和表征,将被解释变量“获得感”及其四项二级指标乘以10。

在妇女个人特征方面,转出组有以下特征:年龄更大、受教育程度更低、非农工作从业者。在家庭特征方面,转出组有以下特征:未持有农业机械、家庭生活条件更好、农业人口占比更低、外出务工人员更多、购买了家庭商业保险、子女数量更少、享受代际支持。在地区特征方面,转出组多处于中部地区。

3. 模型设定

由于被解释变量获得感为连续变量,故采用 OLS 回归模型进行估计。首先,构建方程①检验农地转出与妇女获得感相关关系是否显著: $Gain_sense_i = \alpha_0 + \alpha_1 Transfer_i + \alpha_2 Control_i + e_i$ ①其次,检验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效应是否存在,主要参考温忠麟等^[19]关于中介模型的做法,考量自变量通过中介变量来影响因变量,其检验有以下步骤:第一,因变量 $Gain_sense_i$ 对自变量 $Transfer_i$ 回归,自变量 $Transfer_i$ 的系数达到显著水平,如果不显著,就要停止中介效应分析;第二,中介变量 $Labor_i$ 对自变量 $Transfer_i$ 回归,自变量的系数为 β_1 ;第三,因变量 $Gain_sense_i$ 同时对自变量 $Transfer_i$ 和中介变量 $Labor_i$ 回归,中介变量 $Labor_i$ 的系数为 α_3 ,自变量 $Transfer_i$ 系数为 α_1' ;第四,依次检验系数 β_1 和 α_3 ,如果二者显著,表明存在中介效应。由此,构建方程②和方程③:

$$Labor_i = \beta_0 + \beta_1 Transfer_i + \beta_2 Control_i + e_i \quad ②$$

$$Gain_sense_i = \alpha_0' + \alpha_1' Transfer_i + \alpha_2' Control_i + \alpha_3 Labor_i + e_i \quad ③$$

其中, $Gain_sense_i$ 表示第 i 位农村妇女的获得感, $Transfer_i$ 表示农村妇女 i 的转出情况, $Labor_i$ 表示剩余劳动力转移, $Control_i$ 表示影响农村妇女获得感的控制变量,各变量前的字母表示其系数, $\alpha_0 \beta_0 \alpha_0'$ 为常数项, e_i 为误差项。

三、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1. 农地转出对农村妇女获得感的影响

农地转出对妇女获得感影响的 OLS 回归

估计结果见表 2。为确保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采用了嵌套模型进行分析。具体而言,模型①主要探讨了家庭人力资本特征对妇女获得感的影响估计,模型②在模型①的基础上纳入了家庭物质资本特征,模型③在模型②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了农地转出,模型④在模型③的基础上加入了农户个人特征变量,构成了最终的解释模型。四个模型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随着变量的增加,拟合优度逐渐提高,都具有进一步解释的价值。

表 2 农地转出对农村妇女获得感影响的 OLS 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获得感)			
	模型①	模型②	模型③	模型④
农地转出			0.171 *** (0.054)	0.153 *** (0.052)
年龄				0.438 *** (0.020)
受教育程度				0.505 *** (0.023)
劳动力转移				0.155 *** (0.047)
农业机械		0.090 ** (0.042)	0.099 *** (0.042)	0.111 *** (0.040)
家庭生活条件		0.111 *** (0.030)	0.103 *** (0.030)	0.068 *** (0.029)
家庭商业保险		0.139 *** (0.043)	0.133 *** (0.043)	0.113 *** (0.042)
代际支持		0.203 *** (0.053)	0.189 *** (0.053)	0.122 ** (0.052)
农业人口占比	0.481 *** (0.064)	0.505 *** (0.066)	0.545 *** (0.067)	0.515 *** (0.065)
外出务工人员	-0.011 (0.022)	-0.006 (0.022)	-0.009 (0.022)	0.008 (0.023)
子女数量	-0.026 (0.018)	-0.025 (0.019)	-0.024 (0.018)	-0.003 (0.018)
地区	-0.013 (0.026)	-0.006 (0.026)	-0.002 (0.026)	0.047 * (0.025)
N	8662	8500	8500	8466
Prob > F	0.000	0.000	0.000	0.000
Pseudo R ²	0.007	0.013	0.014	0.100

注:***、**、* 分别表示 $P < 0.010$, $P < 0.05$, $P < 0.1$,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下同。

(1)农地转出的影响

从模型①至模型④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农地转出对农村妇女获得感具有正向影响,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假设 H5 得到验证。农地转出对农村妇女不同维度获得感(经济、政治、民生和发展)的具体影响见表 3。由表 3 可知,农地转出对农村妇女不同维度获得感产生了非均衡性影响,农地转出显著提升了农村妇女的经济获得感、民生获得感和发展获得感,而对政治获得感的改善不明显,这可能不利于当前农地流转工作的持续推进,假设 H1 ~ H4 得到验证。

(2)农户特征变量的作用

模型④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年龄、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妇女的获得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老年妇女的获得感虽受健康衰退、收入减少等影响呈下降趋势,但纵向获得感往往可以提供补偿。随着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农村老年妇女的核心诉求得到满足。同时,青年农村女性面临就业与赡养的双重挤压,形成了代际获得感的落差,这种补偿机制促使老年农村妇女的综合获得感水平更高。受教育程度不仅与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密切相关,还预示着发展空间和自我实现能力。因此,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村妇女获得感水平越高,这一结论与主流观点一致。

(3)家庭特征变量的作用

模型④显示,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

农业机械、家庭生活条件、家庭商业保险、代际支持、农业人口占比对农村妇女的获得感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外出务工人员、子女数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农业机械、家庭生活条件、家庭商业保险和代际支持属于家庭特征中的物质资本特征,物质资本越丰富,农村妇女的生计安全性就越高,获得感水平也就越高。在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方式的家庭中,农业人口占比普遍较高。随着我国从脱贫攻坚全面转向乡村振兴,农民生活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跃升,在这类农业依存度较高的家庭中,妇女因直接参与土地政策受益且更易感知家庭经济地位的实质提升,赋予了其强烈的纵向获得感。外出务工虽然改善了家庭的经济状况,但也加重了留守妇女的家务负担和心理问题;对老人而言,子女数量只是潜在照料者,而不一定是实际照料者,单纯的数量增加甚至会对老人的生活质量造成负面影响^[20]。因此,外出务工人员 and 子女数量并不必然增进农村妇女的获得感。

2. 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效应检验

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因果关系往往是互相缠绕、错综复杂的,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包含多个逻辑环节^[21]。因此,分析农地转出影响农村妇女获得感的中间变量,有利于揭示因果关系之间的复杂机制。在上文分析中,本文认为劳动力转移可能是一个中介变量,农地转出通过劳动力转移这一中介变量来对农村妇女获得感产生影响,因此接下来将采用依次验证回归系数的方法,探究劳动力转移在农地转出影响农村妇女获得感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其中,模型⑨是农地转出对农村妇女获得感影响总效应的回归结果,模型⑩是农地转出对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模型⑪是加入劳动力转移这一中介变量后,农地转出对农村妇女获得感影响的估计结果。

表 3 农地转出对农村妇女不同维度获得感的影响

变量	经济 获得感	政治 获得感	民生 获得感	发展 获得感
	模型⑤	模型⑥	模型⑦	模型⑧
农地转出	0.167 *** (0.001)	0.064 (0.001)	0.078 *** (0.301)	0.130 ** (0.00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N	8466	8466	8466	8466
Prob > F	0.000	0.000	0.000	0.000
Pseudo R ²	0.042	0.034	0.070	0.058

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 4。由模型⑩可知,农地转出可以显著促进农村妇女向非农工作领域转移。农地转出后,为获得稳定且可观的收入,男性会选择优先进城务工,但其收入通常难以覆盖家庭开支。同时,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吸引力、留守妇女的心理问题等都倒逼留守妇女向城市转移。模型⑪的结果显示,劳动力转移可以增进农村妇女的获得感,这是由于工资性收入可以优化家庭收入结构,同时提升农村妇女的经济独立性和自主性,农村妇女还可以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提升了进城务工农村妇女的获得感水平。模型⑪在模型⑨的基础上加入劳动力转移变量,农地转出的系数和劳动力转移的系数均显著,农地转出的系数由 0.164 降至 0.153,表明劳动力转移的中介作用存在。综上,劳动力转移的中介作用存在,假设 H6 得到检验。

3.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将 OLS 回归模型替换为二分类 Probit 回归模型,同时,将连续变量“获得感”替换为二分类变量“获得感”。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5。由表 5 可知,回归结果显示,农地转出对农村妇女获得感的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结论与上述模型④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由此可见,基准回归的结果是可靠的。

4. 异质性分析

异质性分析作为一种深化的研究方法,能够更为精准地分析农村妇女获得感影响因素的

复杂交织与多元特性。通过探究不同群体间获得感水平的差异及其根源,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这些差异背后的深层次机制。农村妇女的获得感受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农地转出对其获得感的影响方向或程度可能因家庭特征的不同表现出显著差异。

农业机械的数量反映了农户生计上对农业的依赖程度,农业依赖程度低的家庭进入非农市场的“沉默成本”相对较低。代际支持与农村妇女健康状况相关,未获代际支持可能意味着农村妇女健康状况良好,转出土地后可以更加顺利地融入非农劳动力市场。对此,本文采用分组回归的方法进行如下异质性分析:一是家庭农业机械持有情况的异质性,将样本分为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⑫
	Probit 回归
农地转出	0.096 ** (0.039)
年龄	0.264 *** (0.015)
受教育程度	0.323 *** (0.018)
劳动力转移	0.096 *** (0.035)
农业机械	0.026 (0.030)
家庭生活条件	0.051 ** (0.022)
家庭商业保险	0.006 (0.031)
代际支持	0.091 ** (0.038)
农业人口占比	0.283 *** (0.048)
外出务工人员	-0.017 (0.017)
子女数量	0.005 (0.013)
地区	-0.001 (0.019)
N	8466
Prob > F	0.000
Pseudo R ²	0.053

表 4 劳动力转移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获得感 模型⑨	劳动力转移 模型⑩	获得感 模型⑪
农地转出	0.164 ** (0.051)	0.052 ** (0.048)	0.153 *** (0.052)
劳动力转移			0.155 *** (0.047)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N	8628	8662	8628

“无农业机械”和“有农业机械”两组;二是代际支持情况的异质性,将样本分为“缺乏代际支持”和“享有代际支持”两组。农地转出对农村妇女获得感影响的分组估计结果,见表6。

就家庭农业机械异质性而言,农地转出对农村妇女获得感的正向效应在无农业机械组正向显著,而在有农业机械组未表现出显著性。这可能是因为,缺乏代际支持的农村妇女有着较好的健康状况和较强的自主能力,在转出土地后,她们能够更顺畅地融入非农工作环境,进而有着更高的获得感水平。

表6 农地转出对农村妇女获得感影响的分组估计结果

变量	无农业 机械	有农业 机械	缺乏代 际支持	享有代 际支持
	模型⑬	模型⑭	模型⑮	模型⑯
农地转出	0.021 *** (0.006)	0.005 (0.009)	0.232 *** (0.058)	-0.202 * (0.116)
年龄	0.046 *** (0.003)	0.041 *** (0.003)	0.445 *** (0.021)	0.390 *** (0.052)
受教育程度	0.043 *** (0.003)	0.060 *** (0.004)	0.502 *** (0.025)	0.582 *** (0.065)
劳动力转移	0.012 * (0.047)	0.019 ** (0.007)	0.156 *** (0.053)	0.161 (0.108)
农业机械	—	—	0.083 * (0.044)	0.205 * (0.098)
家庭生活条件	0.006 (0.004)	0.008 * (0.005)	0.031 (0.032)	0.232 *** (0.071)
家庭商业保险	0.008 (0.006)	0.015 ** (0.006)	0.113 ** (0.045)	0.084 (0.119)
代际支持	0.004 (0.007)	0.021 *** (0.008)	—	—
农业人口占比	0.052 *** (0.065)	0.051 *** (0.011)	0.620 *** (0.072)	0.096 (0.146)
外出务工人员	-0.002 (0.003)	0.007 * (0.004)	0.027 (0.024)	-0.127 ** (0.064)
子女数量	0.000 (0.002)	-0.001 (0.003)	0.003 (0.019)	-0.028 (0.044)
地区	0.005 (0.003)	0.005 (0.004)	0.081 *** (0.028)	-0.103 * (0.061)
N	4840	3626	6974	1492
Prob > F	0.000	0.000	0.000	0.000
Pseudo R ²	0.098	0.105	0.105	0.088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 CFPS 2020 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 OLS 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农地转出对农村妇女获得感的影响,得出结论:其一,农地转出可以提高农村妇女的获得感水平,替换检验方法进行估计后,这一结论仍具有稳健性;其二,农地转出增进了农村妇女的经济获得感、民生获得感和发展获得感,但对政治获得感的提升不明显;其三,劳动力转移在农地转出与农村妇女获得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其四,从异质性分析的结果来看,农地转出仅对无农业机械和不享有代际支持农村妇女的获得感具有正向影响,而对拥有农业机械和享有代际支持的农村妇女获得感产生了抑制作用。

2. 政策建议

从本文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到如下的政策建议。其一,继续稳步推进农地流转工作。获得感是经济社会的重要发展指标,农地转出对提升农村妇女获得感具有显著作用,应当充分发挥农地转出在现阶段提升农村妇女获得感中的积极作用。其二,不断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加快农地流转市场的规范化建设。应重视完善农地流转市场的基础性工作,为农户提供农地流转信息共享服务平台,降低农户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健全农地流转的价格机制,保障农地流转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合法权益,从而提高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其三,健全和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引导进城务工妇女有序参与公共事务,以增强她们的政策认同感和政治信任,提高进城务工妇女的政治获得感,减小农地流转工作推进的阻力。其四,降低转移劳动力“失地”和“失业”风险。农地转出可以通过劳动力转移的中介作用增进农村妇女的获得感,因此政府和村集体应继续鼓励劳动力转移,增

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信心,降低劳动力转移的“失地”和“失业”风险,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后续保障工作,有效发挥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妇女获得感的正向效应。

参考文献:

- [1] 冯华超. 农地确权颁证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20: 1.
- [2] 张广辉, 张建. 农村土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内在机理与实证检验[J]. 经济学家, 2023(2): 120 - 128.
- [3] 曹瑞芬, 张安录. 中部地区农地流转经济效益分析: 基于湖北省 27 个村 313 户农户的调查[J]. 中国土地科学, 2015, 29(9): 66 - 72.
- [4] 柯炼, 黎翠梅, 汪小勤, 等. 土地流转政策对地区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 来自湖南省的经验证据[J]. 中国土地科学, 2019, 33(8): 53 - 62.
- [5] 关江华, 张安录. 农地确权背景下土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5): 143 - 150, 175.
- [6] 张珂, 程久苗, 费罗成. 农地流转农户福利变化研究: 以安徽省小岗村为例[J]. 价格月刊, 2017(11): 68 - 73.
- [7] 王浦劬, 季程远. 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与善治标尺: 人民获得感的意蕴和量度[J]. 中国行政管理, 2018(1): 6 - 12.
- [8] 郑建君. 中国公民美好生活感知的测量与现状: 兼论获得感、安全感与幸福感的关系[J]. 政治学研究, 2020(6): 89 - 103, 127 - 128.
- [9] 聂伟, 蔡培鹏. 让城市对青年发展更友好: 社会质量对青年获得感的影响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21(3): 53 - 60, 119.
- [10] 王思斌. 整合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可持续的获得感[J]. 行政管理改革, 2018(3): 28 - 33.
- [11] 廖福崇. 公共服务质量与公民获得感: 基于 CFPS 面板数据的统计分析[J]. 重庆社会科学,

2020(2): 115 - 128.

- [12] 孙远太. 城市居民社会地位对其获得感的影响分析: 基于 6 省市的调查[J]. 调研世界, 2015(9): 18 - 21.
- [13] 文宏, 刘志鹏. 人民获得感的时序比较: 基于中国城乡社会治理数据的实证分析[J]. 社会科学, 2018(3): 3 - 20.
- [14] 杨烁晨, 杜海峰, 杨晓宁. 土地流转与农村家庭收入差距: 家庭发展视角下的经验探讨[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1): 178 - 191.
- [15] 廖沛玲, 赵健, 夏显力. 农地转出前后农户福利变化及差异研究: 以关天经济区政府主导型农地流转为例[J]. 资源科学, 2018, 40(7): 1354 - 1364.
- [16] 刘远凤. 土地流转何以提升农民的获得感: 基于产权认知的视角[J]. 社会科学辑刊, 2022(3): 71 - 78.
- [17] 白鹏飞, 李建军. 智慧农业创新动力机制: 基于推拉理论的分析框架[J]. 科学管理研究, 2022, 40(1): 130 - 136.
- [18] 唐超, 邱海兰. 农地整合确权对农村劳动力农内转移的影响评估: 基于农地流转的中介效应[J]. 农村经济, 2020(8): 44 - 51.
- [19] 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 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5): 731 - 745.
- [20] 郝鑫, 李荣超, 甘甜. 为何“多子未必多福”? 子女数量对老年人抑郁情绪的影响[J]. 应用心理学, 2024, 30(2): 149 - 157.
- [21] 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5): 100 - 120.

[责任编辑: 侯圣伟 张省]



引用格式: 温顺生, 郑源. 农地转出对农村妇女获得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 CFPS 2020 的实证分析[J].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6(5): 85 - 94.